

统计分析 报告选编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1985—1986

中国统计出版社

统计分析报告选编

TONGJI FENXI BAOGAO XUANBIAN

1986—1987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北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33万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037-0163-3/C·74

定价：5.20元

前　　言

《统计分析报告选编》(1986—1987)和读者见面了。1986年7月出版的《统计分析报告选编》，汇集了1985年国家统计局举办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的省辖市统计局首届优秀统计分析报告评选活动的部分获奖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本小册子，又汇集了1986、1987年两届评选活动的部分获奖作品。

近两年来，随着统计改革的深入和统计优质服务的开展，统计分析工作进一步加强。各地统计部门编写的统计分析报告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内容丰富多样，形式灵活多样，针对性、政策性、时效性都有所提高。这一时期，统计分析的主要特点：一是为党政领导提供宏观决策的分析资料增多；二是反映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情况的分析资料增多；三是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重要会议需要的分析资料增多；四是统计实际与预测未来的分析资料增多。选入这本小册子的优秀统计分析报告，就是这些特点的体现。

搞好统计分析，是提高我国统计工作水平，扩大统计影响，增强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为了继续向广大统计人员提供一些学习统计分析的材料和交流各地统计分析工作的经验，是我们再次编辑《统计分析报告选编》的目的，并期冀着通过它为进一步提高全国统计分析水平起些作用。

这本小册子，也适合财经院校师生以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作为教学和进行经济分析的参考资料。

为保持原作品的写作特点、风格和技巧，以求真实地反映各地区统计分析水平，在编辑过程中，一般未作修改。为了使读者把握作品的实用价值、主要长处和社会效果，对每篇分析报告都加了“编者评介”。

由于我们编辑这本小册子时间较短，加上编辑人员的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当之处，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年1月

目 录

近8年来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

经济运行的考察 上海市统计局(1)

加快辽东半岛及沿海地区向外向型经

济转化的步伐 辽宁省统计局(23)

重视工业增长的实效速度

——1986年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的分析

..... 江苏省统计局(46)

小氮肥工业的出路何在 河北省统计局(62)

平价化肥哪里去了 安徽省农调队(73)

选择江苏主导工业的刍议 江苏省统计局(77)

上海工业结构沿革的趋势及发展方向 上海市统计局(99)

八年来福建省工业结构变化初析与优化

构想 福建省统计局(124)

湖北工业企业消化能力的现状及

对策思考 湖北省统计局(138)

江苏省“双增双节”运动的初析 江苏省统计局(149)

粤北山区经济调查情况报告 广东省统计局(165)

1985年吉林省农村产业结构初步分析... 吉林省统计局(183)

畜牧业在西藏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及前景

分析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194)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振兴农村

| | |
|---|--------------|
| 经济的根本途径..... | 山西省统计局(205) |
| 1985年陕西省国民收入持续增长，但 积累率大幅度上升..... | 陕西省统计局(216) |
| 关于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合理规 模的探讨..... | 天津市统计局(229) |
| 上海外贸出口徘徊下降原因..... | 上海市统计局(243) |
| 北京城乡居民消费特征及发展前景 分析..... | 北京市统计局(251) |
| 对浙江农民致富路子的初步分析..... | 浙江省统计局(265) |
| 山西农民收入“六五”回顾和 “七五”展望..... | 山西省统计局(288) |
| 对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消费结构 的探讨..... | 黑龙江省统计局(307) |
| 从北京居民高消费“后遗症” 所得到的启示..... | 北京市统计局(330) |
| 对河南省七年市场物价的回顾..... | 河南省统计局(341) |
| 工业品价格变动、改革及其对辽宁省 经济的影响..... | 辽宁省统计局(359) |
| 城市居民在价格改革中的心理 承受能力..... | 天津市统计局(368) |
| 特点、趋势、对策 ——辽宁人口“六五”变动特点和 “七五”及以后发展前景..... | 辽宁省统计局(375) |
| 天津市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研究..... | 天津市统计局(387) |
| 一项亟待重视、扶持的事业 ——沈阳市收旧利废行业调查分析... | 沈阳市统计局(402) |

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湖南省青少年违法犯罪

情况调查..... 湖南省统计局(413)

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1984年沈阳市离婚情况

简要分析..... 沈阳市统计局(435)

对四川电力供求的近期预测与

对策的研究..... 四川省统计局(444)

2000年湖北宏观经济规划模型预测

结果分析..... 湖北省统计局(468)

黑龙江省宏观经济模型的建立及对到本世纪

末国民经济发展的预测..... 黑龙江省统计局(483)

近8年来上海经济体制改革 和宏观经济运行的考察

上海市统计局

编者评介：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上海市统计局组织编写了这篇分析报告。

这篇分析报告以上海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运行为基点，对宏观调控、市场机制和分配行为等三个人们极为敏感的问题进行了定量的统计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的写作特点是：数据引用恰到好处、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观点鲜明、立据准确，是一份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实证性统计分析报告，对领导进行宏观决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这篇分析报告，受到上海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世界经济导报》已全文发表。

0.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上海经济处于发展模式、体制模式、经济结构三个转换相结合的时期，在新旧运行体制、管理方法和价格体制相互交叉、逐步过渡中，改革在健康顺利地发展，全市国民经济进入了建国以来发展生机旺盛的成长阶段。

0.2 八年间，上海体制改革和经济调整的综合效应使各经济要素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积累起来的潜能得到大规模的释放，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新格局。197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变量显示：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8.9%，国民收入增长83.2%，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5.1%，三者的年平均递增率都在7%以上。地方财政收入摆脱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八年累计上交给中央1144亿元。同时，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得到了较多实惠，生活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包括奖金、津贴）比1978年增长1.4倍，平均每年递增11.4%，农民人均分配收入比1978年增长2.6倍，平均每年递增17.4%，均大大超过了改革前26年收入的增长速度。

0.3 然而，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各要素、参数之间的不断扬弃、校正、更新发生了较大的摩擦与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给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带来的负效应已引起了各方面的注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关头，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入的抉择牵系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0.4 本文的目标是以改革后上海经济发展的历史跨度作为经济环境座标，从上海宏观经济振荡、市场体系形式和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这三个焦点，利用统计资料，对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特点进行刻画。通过对宏观调控、市场机制、分配行为的重新组合进行实证性考察和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期对上海今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向的决策选择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一、上海经济波动的特征

1.1 1978年以来，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次快速增长，尽管程度（幅值）上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但是已经成为经济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的焦点在于：1978年、1984年的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健康的还是“过热”征兆？这种经济波动是否有一般规律性可循？

（一）上海经济增长呈周期性波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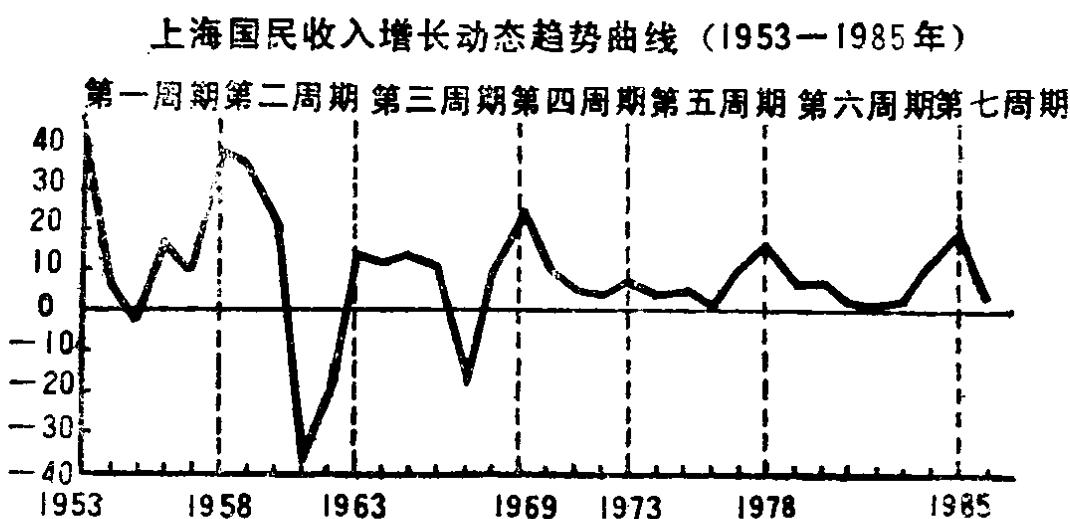
1.2 为了正确地判断改革后八年间上海经济增长的形态，寻找其波动的基本规律，我们先把视角移向历史，延长经济环境的坐标轴，用一个更长的时期加以考察，并寻找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以便对于改革后八年的经济增长形势作一科学定论。

从上海国民收入增长动态曲线（见图一）上，我们已经注意到上海三十多年来宏观经济总量反复出现的波动现象，这种现象表明：上海经济发展速度的基本态势是呈波浪型前进的。

1.3 再作进一步认识，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国民收入增长动态趋势曲线上出现的上拐点之间或下拐点之间形成了7个周期。观察每个周期，可以看到这种周期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每个周期持续时间一般为4年至6年。其中上升期一般为2年，其余为下滑或平滑期。

第二，负增长的低谷点已经从第四个周期开始消除。



第三，每个周期内增长速度的升降振幅渐趋缓和，不再出现大起大落的经济振荡点。

1.4 针对上述分析，可以作出下述判断：在我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最多只能维持两年，而这两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效果是原材料、能源的高度紧缺，基本建设投资的“兴奋度”迅速提高，重复建设，产品积压的现象俯拾即是，造成经济环境全面紧张。而对高速增长的报应则是连续3—4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跌，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的总体效应被破坏殆尽，国家不得不化大力气进行经济调整。然而调整所带来的宽松经济环境往往又会一次次被高涨的“经济增长冲动”席卷而去，经济再次进入一个周期。

（二）改革后八年上海经济周期特征依旧

1.5 我们再把视线收回，剖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

经济波动和周期性问题。有趣的是，这八年的变动状态恰恰是一个周期断面，并且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高峰阶段：（1978年—1979年）这一阶段的真正起始是1977年，人们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解脱出来，长期被经济不景气压抑的潜力卷带着旧体制固有的急于求成的冲动，掀起了以高指标和大量盲目引进为主要特征的“洋跃进狂热”。1978年，上海的积累率达到41%，投资总额增长57%，在八年中处于最高水平。

缓速阶段：（1980年—1981年）由于高峰阶段的国民经济增长已经超过生产能力及相应的物资供应能力的上限，原材料、燃料供不应求，各种需求连锁地收缩，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充分暴露，经济增长遇到客观物质的限制，速度开始下降。根据这一情况，中央及时提出了“调整经济”的政策，经济的降温使调整政策得以实施。

低谷阶段：（1982年）整个周期中，1982年可以说是经济最为宽松的一年，虽然经济增长幅度仅为1.4%，但前几年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开始趋于缓和，部分商品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供给略大于需求的理想环境隐约可见，国民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效，经济增长露出了健康良性发展的端倪。

回升阶段：（1983年—1985年）经过调整，经济环境松弛，小面积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这种情况下，追求高速度的习惯冲动再一次萌发。这次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伴随着的经济特征除了原有的“投资饥渴症”得以迸发外，还出现了以“消费早熟”为特征的消费需求膨胀症，导致1985年经济增长回升到顶端，增长速度高达20.1%。

历史又证明，这种引起经济高度紧张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后果就是1986年经济增长率下降16.4个百分点。

1.6 以上分析描述了八年来上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现实过程。这一象表明，直到目前为止，旧体制的惯性还在制约着我国的总体经济，旧体制的顽性是根深蒂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正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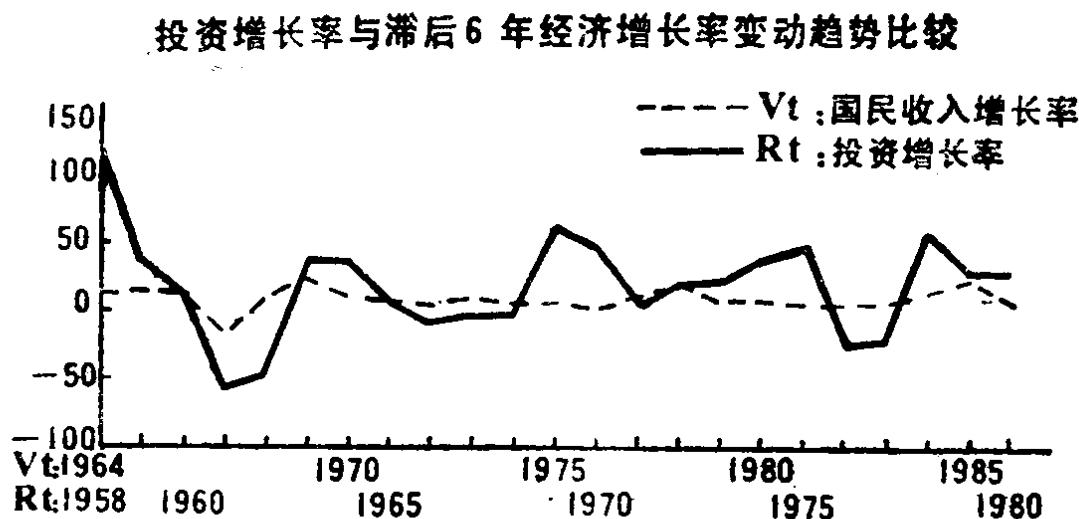
(三) 上海经济波动的内因和对策

1.7 从我们已掌握的政策效应反馈和统计资料所显示的历史轨迹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周期性变动的直观原因是政府经济决策的成功与失误，而较为隐蔽的内在动因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系统内在机制的变动之规律性。

投资增长引起经济增长的长期波动

1.8 统计回归表明，经济增长波动与投资增长波动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并且具有以下重要特征：第一，投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呈同方向变化，且投资增长率的振荡幅度大于国民收入振荡幅度。第二，国民收入增长率决定同期的投资增长率。当经济加速时 投资往往加倍扩张，当经济缓速时，投资是压缩的主要对象。第三，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决定了投资增长波动与国民收入波动之间存在着时滞。根据超前期投资增长与本期国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判定系数，投资滞后期最长为6年。我们发现，把上海投资增长率的动态曲线在坐标轴上向右平移6年，再同上海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动态曲线叠合起来，（见图2）表现出高度吻合。可见，国民收入增长通常由超前6年的投资增长率所决定的。

1.9 据此可以认为，投资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如果把投资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进一步分解，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当投资增长达到某一高度继续加速时，国民收入增长率由高峰转而缓速下滑，当投资增长减速到某一高度继续下滑时，国民收入增长率由下滑转而开始加速上升。例如，1979年—1982年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而起决定作用的投资增长率（1973年—1976年）却呈加速上升趋势。这表明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它所产生的瓶颈现象会抵消投资增长所带来的效益，对经济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1.10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分析中可以得到这样的预测：1985年以后的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轨迹，是由前一个投资增长率周期的上凹型曲线所决定。1986年后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将平滑2—3年，整个“七五”期间不会出现太为明显的增长高峰。

产业结构矛盾引起国民收入增长短期波动

1.11 上海的产业结构存在着突出矛盾，能源、交通、部

分原材料等短缺资源供给不足，企业内部资金短缺和产品积压同时发生。在工业内部，又表现出各部门增长动态的不稳定性。

我们利用15个工业部门的净产值数据，分析了各部门对全市工业净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计算结果表明：各门部增长结构的不稳定性客观上对国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影响，如纺织工业，1981年对全市工业净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103%，1982年则为-285%，而1983年降至-1243%。因此，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是制约经济顺利发展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见效最快

1.12 一般认为，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直接因素，不外乎劳动者的数量与劳动生产率，但是，就两者来说，后者更具有显著性，在我国劳动力十分充沛的情况下，“隐蔽性失业”现象较为突出，国民收入增长率与职工人数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66，而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系数则高达0.96。显然，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回归方程显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效益大于1，即规模报酬递增。当劳动生产率每增长1%，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13%。因此，为促使经济的实在增长，避免由于投资过热或压缩，产业结构的矛盾使经济增长的振幅波动过大，必须通过切实手段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

1.13 以上事实和分析充分说明这样的结论：在短缺经济的社会里，旧体制的惯性目标往往是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要有一丝可能，投资膨胀的热潮，经济增长的冲动就不能避免，人们朴素而良好的愿望总是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越

快越好。但是，客观规律已经证实，中国的经济不能超高速度，超高速度政策的刺激所取得的效应往往是经济大幅度下降，伴随而来的则是经济的大量损失。可以说，那种经济超高速增长是以经济效益的牺牲作为代价的，这一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1.14 我们认为，经济的增长应该保持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率，尽量缩小波动振幅。这一增长率能给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较为合适的经济环境，能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各种经济效益得到充分体现，并能保证财政收入和人民收入稳定增长。那么，如何来确定这一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呢？

计量分析表明，上海经济增长率摆动的平衡位置基本上在0.07—0.08的区间里，而它所对应的福利指标亦是八年中的最大值。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较长一个时期里，上海经济发展最佳增长速度以每年7%左右为最适度。这一结论的得出，有助于在宏观间接计划控制中，采用较为谨慎的政策措施，使经济增长率围绕这一中心波动，以减小其振幅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那么历史上经济增长狂热所带来的损失就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二、市场体系的形成需要配套改革

2.1 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特别是1984年下半年出现了宏观经济失衡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宏观间接控制与微观组织反应之间的中介——规范性市场尚未形成之前，宏观调节措施的盲目性较大，间接控制手段奏效甚微，单纯放权会引起旧体制惯性的膨胀。只有建立一个包括各种生产

要素的、完整而开放的市场体系，才能把宏观经济控制与微观经济搞活恰当地组织起来。

2.2 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上海在完善和培养市场机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各类市场破土而出，基本勾画出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雏形轮廓，从中透出下列特征：

(1)消费品市场迅速发育成长。本市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商品品种数量由1978年的188种调减为1986年的23种。全市涌现了各类贸易中心13个，贸易货栈和批发市场49个，农贸市场386处，小商品市场33处。

(2)生产资料市场开始突破产品经济的分配调拨模式，初步形成三级层次交易网络。国家统配的生产资料从1980年256种减为1986年的23种。全市建立了生产资料贸易中心13个，专业化的生产资料商店23家。

(3)短期资金市场正在萌芽。试办了票据、承兑贴现、同业拆借、卖方信贷、金融租赁等融资方式，活跃了短期资金市场。

(4)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市场开始起步。出现了300多家从事技术商品经营的机构；64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试办了人才交流中心、人才银行。

但是，在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过程中，新旧体制交替的弊端充分袒露，各种始料不及的现象以及传统习惯效应对新体制的成长过程形成了强大的冲击，配套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 货物市场的串联作用给价格改革带来沉重的压力

生产资料市场先天不足